

清史論叢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清史研究室 编

貳零壹壹年号

11 年號

清史論叢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清史研究室 编

貳零壹壹年号

11 年號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清史论丛. 2011 年号/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清史研究室编. —北京: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2011. 1
ISBN 978-7-5043-6316-9

I. ①清… II. ①中… III. ①中国—古代史—清代—
文集 IV. ①K249.07-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238204 号

清史论丛 (2011 年号)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清史研究室 编

责任编辑 刘川民
封面设计 丁琳 李佳临
责任校对 张莲芳

出版发行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电 话 010-86093580 010-86093583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真武庙二条 9 号
邮 编 100045
网 址 www.crtv.com.cn
电子信箱 crtp8@sina.com

经 销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廊坊市人民印刷厂

开 本 787 毫米×1092 毫米 1/16
字 数 432 (千) 字
印 张 22
版 次 2011 年 1 月第 1 版 2011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2000 册

书 号 ISBN 978-7-5043-6316-9
定 价 45.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印装有误 负责调换)

目 录

清代南府考	王政尧 (1)
柳敬亭卒年考析	
——四谈柳敬亭问题	何龄修 (20)
“‘康乾盛世’再思考”研讨会概述	李 娜 (25)
“康乾盛世”与历史意义的采择	姚念慈 (27)
“康乾盛世”说渊源考	李华川 (33)
试论清代科场中的谎报年龄现象	李世愉 (45)
“举人大挑”述略	贺晓燕 (56)
清代进士人数补考	邹长清 (78)
清中前期宫廷满洲祭祀典礼的制作及其意义	邱源媛 (91)
论清代宝玺的发展与变化	恽丽梅 (118)
“乾隆年制”天地人刀剑考	毛宪民 (136)
入关前的贝勒庄屯	邢新欣 (163)
清代雍正时期京西的水利营田	李成燕 (180)
天气对清军两征金川之多重影响	王惠敏 (197)

从清宫档案记载剖析嘉庆帝遗诏案	郝艳红 (212)
清代民间宗教述论	李尚英 (227)
朱筠学述	林存阳 (246)
1903 年至 1904 年英国入侵西藏一行涉藏著作研究	梁俊艳 (277)
《清朝续文献通考·经籍考》史源探析	李立民 (295)
“最为持平”之约	
——对晚清中国与拉美国家建交条约的认识	王士皓 (305)
清代开台进士郑用锡对台湾的影响	吴惠巧 (316)
18 至 20 世纪中国生活水平与人力资本的演变	
——来自实际工资与人体计量学的证据	[德] 依尔格·巴特恩 撰
	[英] 马德斌 [英] 司马辉 [德] 王清
	徐毅译 (326)

清代南府考

王政尧

南府是承应清代内廷演戏和演乐的重要机构。这一机构上承教坊司、掌仪司,下启升平署,自康熙中至道光七年,历时一百四十年,而这近一个半世纪正是清王朝走向全盛的重要时期,即所谓“百年盛世”,它见证了清王朝由盛而衰的历程。因此,深入研究南府,对于研究清代戏剧文化、清代宫廷戏剧发展史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在此项课题研究的过程中,我们首先遇到的问题就是南府是在什么时间建立的?这是研究南府时一个绕不开的问题。时至今日,关于南府是在清代哪一朝建立的,仍存两说,即“乾隆说”和“康熙说”。本文拟从这里谈起,一得之见,不敢自必,愿共同讨论。

一、乾隆朝始建南府之不确定

1933年,一位前辈大家在一篇文章中率先提出:“乾隆下江南,带回昆班及昆曲名宿若干人,在内廷供奉,但因人数添多,遂迁入南长街吴駉马府,改名曰南府。专教太监,而自己则不登台。”^①1936年,这位先生在他的另一部著作内强调:“同光后,梨园子弟皆属南府,民国后,因南府地界属民国,于是又将南府所有案卷,又移入景山。”^②显然,这位研究家这里指的南府和他之前说的南府同属一址,仍是其“乾隆说”的又一证。此后,另一位前辈大家经过考证,将南府建于乾隆朝的时间写得更加具体,他说:“是知南府得名,应在(乾隆)五年至十九年之间。”“南府虽于乾隆初即成立,但终乾隆之世,未列官职。”^③他的另一部著作《清代伶官传》也持此说。然而,需要说明的是,早于他们著作刊印出版的1928年(民国十七年)2月,在故宫博物院

① 齐如山:《谈升平署外学角色》,见北平国剧学会《戏剧丛刊》第三期,1933年12月。

② 齐如山:《京剧之变迁》,1936年北平国剧学会出版。

③ 王芷章:《清升平署志略》第二章“沿革”,国立北平研究院,1937年。

图书馆掌故部出版的《掌故丛编》就已刊出了康熙帝有关南府的上谕，然而，他们当时并未注意到这部重要文献。《掌故丛编》是北京故宫博物院最早发布的明清档案公开出版物，书内所刊文献为清代官修史书少见或未见，因此，其史料价值甚高。笔者将在下文另有考论，此不赘述。

进入21世纪之后，南府建立于乾隆朝之说在一些著作中继续出现，引起了笔者的关注。2000年1月，由北京出版社出版的《燕都梨园》中写道：“乾隆皇帝喜欢观剧，于1740年（乾隆五年）设立南府，挑选内监，专司宫廷演戏事宜。”2001年1月，在中国旅游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古代帝王与梨园史话》中同样认为乾隆时期成立了南府，书中指出：“乾隆皇帝为扩充宫廷演戏的机构，把和声署移到了南海和南长街之间的南花园，改称南府。”此外，其他相关著作也有此相似的认识。

如果南府果真如上述诸位研究家所言，该机构于乾隆朝方成立，那么，秘藏在故宫懋勤殿的圣祖谕旨为什么会出现“问南府教习”（全文请见下段）的上谕呢？笔者在研读了诸多满文档案、汉文档案和清代官私史著后，认识到南府建立于乾隆朝之说是有违史实的，应予纠正。

二、南府之名最早出现在懋勤殿秘藏圣祖谕旨之洪字箱内

清圣祖康熙帝在位的61年大致可分为三个时期，自康熙二十一年（1682）至康熙四十二年（1703）为康熙帝执政的中期。这一时期，康熙帝励精图治，致力于发展生产，治理河务、安定民生，稳定社会；与此同时，他还亲自指挥统一台湾、抗击沙俄入侵、平定准噶尔叛乱，取得了一系列重大胜利，清王朝也由此而进入了它的全盛时期。南府之名正是出现在这一时期之中。

故宫懋勤殿旧藏圣祖谕旨档中有一道传给南府教习的上谕，原文如下：

问南府教习朱四美，琵琶内共有几调？每调名色原是怎么起的，大石调、小石调、般涉调，这样名知道不知道，还有沉随、黄鹂等调，都问明白。将朱之乡的回语叫个明白些的，著一写来。他是八十余岁的老人，不要问紧了，细细的多问两日，倘你们问不上来，叫四阿哥问了写来，乐书有用处！再问屠居仁，琴中调亦叫他写来。乾清宫、养心殿、畅春园各处收的做箫笛管子之料，朕记得有来，如今可不知还在否？尔等着速细察，若有报上带来，毋误！^①

^① 故宫博物院图书馆掌故部编：《掌故丛编》第二辑《圣祖谕旨二》，1928年2月。

笔者认为,这道没有具体年代的谕旨应是康熙三十年的上谕。欲知其为康熙三十年的事,首先应确定这道上谕出自康熙朝。

“问南府教习”等上谕:“诸稿原藏懋勤殿洪字八〇八号箱内,箱面题记云:‘此内……为圣祖仁皇帝所交事件。雍正十三年十月二十日奉旨交本房收贮,非捧至御前不可擅自开看,如违者,即行正法!’”^①《题记》作为原始资料已明确注明了此谕是康熙帝交办之事,毋庸置疑。同时,上引谕旨及其他诸多谕旨均“为《实录》、《圣训》、《东华录》所不载者,年月皆无可考”^②。笔者在此再补充一点,除以上三部官书未载此谕外,《康熙起居注》也未载。

谓明确写有“南府”的此谕原自康熙三十年(1691),理由如下:

1. 通篇上谕要解决的重点问题是:通过问南府教习朱四美、屠居仁,明确琵琶和琴的音符音阶,相应的各种调是怎么起的。

2. 康熙帝因朱之乡年事已高,再三叮嘱:“不要问紧了,多问两日,”不成的话,叫四阿哥(即后来的雍正帝)去办。这说明康熙帝非常重视此事。

3. 与此同时,康熙帝对查找制作箫、笛之料的要求是“着速”、“细察”、“毋误”!

4. 康熙帝对于这一问题如此重视,且要求快速的目的只有一个:“乐书有用处”。

“乐书”是一部什么书?终康熙一朝,官修乐书只有一部,即《律吕正义》。此时,这部官修乐书尚未定名,说明本书处于草撰、讨论阶段。康熙帝关于此道上谕的内容于次年(康熙三十一年)正月初四在《清圣祖实录》中有了详明记载,原文记有:

是年甲寅“上御乾清门,召大学士、九卿等,至御座前……又指五声八音八风图曰:‘古人谓十二律定而后被之八音,则八音和,奏之天地,则八风和,而诸福之物,可至之祥,无不毕至。其言乐律,所关如此其大!而十二律之所从出,其义不可不知……至隔八相生之说,声音高下,循环往生,复还本音,必须隔八,此一定之理也。’随命乐人,取笛和瑟,次第审音,至第八声,仍还本音。上曰:‘此非隔八相生之义耶?以理推之,固应如是。’”

康熙帝这段生动的论述在蒋氏《东华录》、王氏《东华录》等清代官私史著均有记述。尤为重要的是:通过康熙帝有关八音的论述和笛瑟的八音演奏,使我们清楚地辨识出《清圣祖实录》第一百五十四卷的上述记载与懋勤殿秘藏“问南府教习”的那段上

① 故宫博物院图书馆掌故部编:《掌故丛编》第一辑。

② 故宫博物院图书馆掌故部编:《掌故丛编》第二辑。

谕的因果关系。它解决了琵琶和琴“共有几调”等康熙帝所关心的具体问题。所以，康熙帝才有在春节期间的正月初四即与群臣讨论此事之前的“着速”、“细察”之举。故此，我们可以认为康熙帝“问南府教习”的这段重要上谕应是康熙三十年十二月前期的事。康熙五十三年十一月之前，《律吕正义》即将告成，但因缺乏做乐器的上好竹子，康熙帝“特谕”苏州织造李煦，“尔等传于苏州清客周姓的老人，他家会做乐器的人、并各样好竹子，多选些进来，还问他可以知律吕有人一同送来，但他年老了，走不得，必打发要紧人来才好。特谕！”^①是谕说明康熙帝对编好本书是非常重视的。

有清一代，在以下三部著作中都明确提出南府于康熙朝即已有之，这需要引起我们的注意，从而再次说明南府建于乾隆朝是不正确的。在这方面，笔者首推吴振棫之《养吉斋丛录》。

吴振棫，浙江钱塘（今杭州市人），嘉庆十九年进士，其著《养吉斋丛录》以研究清代典章制度和内廷宫殿园苑见长，是书很受时人和后人推重。他在谈到南府时曾经指出：“康熙间即有南府之名。道光初元，将南府人一概遣还。”^②其次，另一位杭州人、光绪年间的举人徐珂在编纂《清稗类钞》时记有“南府之名，始自康熙时”^③。所以，久居京师、深谙北京人文地理的饱学之士吴长元写道：“南花园今改名南府，为梨园子弟所居，称南府学生。”^④

其时，在清初宫廷，与音乐有关的机构还有教坊司、掌仪司、銮仪卫、景山等。值得注意的是，康熙帝在遇到上述问题时，对以上机构和相关教习概而不问，唯独传谕南府教习，说明南府的教习们经过了时间的检验，致使康熙帝很看重南府和那里的教习们，彼时的南府可谓人才济济！此外，从康熙帝传谕的口气上分析：南府应早于康熙三十年之前就已成立了。

三、南府建立在何年

1992年，大连市图书馆馆藏《清代内阁大库散佚满文档案选编》出版，^⑤是书主译者、满语名家关嘉禄研究员随即从辽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将此译著寄赠与我，笔

① 故宫博物院图书馆掌故部编：《掌故丛编》第二辑。

② 吴振棫：《养吉斋丛录》卷13，北京古籍出版社，1983年12月。

③ 徐珂：《清稗类钞》第十一册《戏剧类》，中华书局，1984年12月。

④ 吴长元：《宸垣识略》卷16《识余》，北京古籍出版社，1982年4月。

⑤ 本书系大连市图书馆藏、辽宁社会科学院、大连市图书馆文献研究室、辽宁省民族研究所历史研究室译编、天津古籍出版社，1992年4月。以下，本文凡引是书之档案，不另加注，专此注明。

者在致以衷心感谢的同时,结合我的清代戏剧文化课题,对这部文献进行了认真的学习、研究。其后,我在1994年第二期《清史研究》的一篇论文内提出:“满族入关后,一个专门负责太监会学戏、排戏的新机构——南府已于康熙年间出现。至迟在康熙二十五年(1686)的满文档案史料就已出现‘南府’名称。”^①自此,一些同行专家认同了我的这一新看法。令人遗憾的是,有的研究者在认同笔者这一观点,引用或转引这部文献时却出现了不应有的常识性失误。

关于南府建立的时间及其相关问题,我的研究一直在进行。多年的研究,使我对南府建立的时间又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即:康熙二十五年是南府的建立之年。关于这一认识的产生。略考如下:

(一)众所周知,清代内阁大库散佚档案是研究清史、满族史、清代宫廷史的第一手珍贵史料,但就目前所看到的这些原始文献,并向本书的编译家请教之后,尚未看到内阁大库散佚档案中有记录康熙二十五年以前有关南府的原始文献。与南府相关的机构,如涉及掌仪司的康熙二十年十月《总管内务府下各司关于宫廷用项开支银两的本》和康熙二十一年九月二十八日《总管内务府下各司关于宫廷用项开支银两的本》都有“准掌仪司来文”,为“教习弹琴太监之人”和“教习舞碟子太监之人”开支银两之事。南府成立后,这种准掌仪司开支事的记录在内阁大库散佚档案中仍然存在,但已不见为教习们请求开支的记载。这种现象值得关注。

(二)康熙帝亲政后,时人评之曰:“自康熙二十年以后,海内始有起色。”^②这种评价是恰当的。此后,直至康熙二十四年,康熙帝取得雅克萨之战的重大胜利的四、五年间,在《康熙起居注》、《清圣祖实录》、《清圣祖圣训》、《康熙御制诗文集》、康熙朝满文、汉文朱批奏折《汇编》、《懋勤殿圣祖谕旨档》、《东华录》等清代官私史著中,同样没有看到此前的南府记录。

(三)康熙二十年(1681)九月,清军收复了云南。康熙帝指挥清军将士终于彻底平定了这场费时8年之久、战火遍及半个中国、对清初社会伤害极大的三藩之乱。为此,群臣请康熙帝上尊号,诚恳之情,溢于言表。康熙帝则断然拒绝。他指出:叛乱虽已“削平”,但“疮痍尚未全复”^③。当今之势,“兵民交困”、“水旱频仍”、“被创者未起”、“困苦者未醒”、“吏无鲜洁之效,民无康复之休”。“君臣之间,全无功绩可言”!从今以后,君臣之间要“益加修省,恤兵养民”,“砥节励行,休养苍黎,培复元气”,逐步实现“政事务求当理,官职务在得人,期于家给人足”的政治局面。康熙

① 请见拙文:《满族入关与清前期戏剧文化》,原载《清史研究》1994年第2期,第39页。

② 《皇朝经世文编》卷28,《论直隶兴除事宜疏》。

③ 《清圣祖实录》卷99,下同。

二十二年（1683）八月，清军顺利进入台湾。八月十五日，捷书到阙，康熙帝随即赋诗，“海域久念苍生困，耕凿从今九壤同！”“岛屿全军入……南纪尽安流。”^①此时此刻，他在高兴之余，强调的仍是治天下之道，“但求平易宜民而已”^②，以期长治久安。次年，再次强调“念致治之道，务在精勤，励精图终，勿宜有间”^③。康熙二十四年，清政府取得了抗击沙俄入侵的雅克萨之战重大胜利之时，河务和漕运均取得了新的进展，治河的方案在论证，漕运的吏治在整顿，更有神州一统、大败入侵之沙俄，清王朝开始进入全盛时期已是不争的事实。于是，民生安定，经济发展，国势日强，上述形势为康熙帝建立南府和进行其他改制提供了良好的政治环境和稳定的社会基础。

（四）康熙帝曾说：“朕自听政以来，以三藩及河务、漕运为三大事，夙夜靡盬，曾书而悬之宫中柱上。”^④平定了三藩之后，又迎来台湾的统一，康熙二十二年，他“以海宇荡平，宜与臣民共为宴乐，特发帑金一千两，在后宰门驾高台，命梨园演《目连》传奇，用活虎、活象、真马”^⑤。距今三百多年前，京师昆腔诸戏班奉旨演出此剧，其场面之大、演技之精、阵容之强都堪称是高水平的！其中，“刀梯之戏，优人为《目连》剧者往往能之。然其矫捷腾跃，远胜于巫，非奇事也”^⑥。此剧公演之后，产生了强烈的反响，成了当时北京的满、汉等族官民的热门话题，“彩灯花爆，昼夜不绝”。康熙帝对于演出成功深感满意。仅据目前所能见到的史料，笔者认为：此次出自康熙帝本意的隆重而盛大的庆祝活动，应当看作是昆曲在满族入关以来的第一次大规模的演出。此次公演，不仅充分表明了以康熙帝为代表的满族统治者对昆曲艺术的认同与支持，同时，促使满族广大人民对昆曲更加喜爱。显而易见，这次演出对以昆曲为主的戏剧文化在清前期的繁荣与发展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值得注意的是：（1）本次演出的《目连》传奇很可能是经过内廷修改过的演出本，“现藏首都图书馆，其第十本第二十三出的宾白，有‘幸逢康熙二十年十二月二十日，因天下荡平，广颁赦诏，十恶之外，咸赦除之’等语，可知康熙二十年即已有了目连戏的宫廷改编本”^⑦。说明那时康熙帝即有因此次重大胜利而举行庆祝演出之意，而他没做此举的原因是“兵民困苦已极”、国家大伤元气、君臣之间“全无功迹可言”！（2）康熙帝是在“命梨园演《目连》传奇”，而不是命南府成立之前、朝廷中与演剧有关的如掌仪司、教坊司等参与其事。显

① 《康熙御制诗之集》卷38下。

② 《清圣祖实录》卷112。

③ 《康熙政要》卷24，《论慎终》。

④ 《清圣祖实录》卷154。

⑤ 董含：《蓴乡赘笔》，下同。

⑥ 刘献廷：《广阳杂记》卷2。

⑦ 张庚、郭汉城主编：《中国戏曲通史》，第1154页，中国戏剧出版社，1992年4月；刘桢：《中国民间目连文化》，第56页，巴蜀书社，1997年7月。

然,他们不具备如此演出《目连》传奇的能力!(3)康熙二十三年七月后,日讲起居注官翰林院侍讲学士、康熙帝的近臣高士奇已写成《金鳌退食笔记》,书中虽写道南花园等与后来“南府”密切相关的地和事,但只字未提南府建立与否。是年九月二十八日,康熙帝首次南巡。他在走访民情、考察吏治、亲视河务、解决漕运之时,他还饱赏南方昆曲,大过戏瘾,大开眼界,大长见识。“(十月)二十六日至苏州,由北童子门登陆,即上马进阊门大桥……随请到铺设行宫内去……皇上进内,竟至河亭上座……唤工部曰:‘祁和尚(按:即祁国臣,奉天人,时任苏州织造),我到你家用饭罢。’即起身,同工部出行宫,上马南去。到工部衙门,进内至堂上,自将公椅移在东壁,西向而坐……上曰:‘这里有唱戏的么?’工部曰:‘有。’立刻传三班进去,叩头毕,即呈戏目,随奉亲点杂出。戏子禀长随哈曰:‘不知宫内体式如何?求老爷指点。’长随曰:‘凡拜要对皇爷拜。转场时不要背对皇爷。’上曰:‘竟照你民间做就是了。’随演《前访》、《后访》、《借茶》等二十出,已是半夜矣……次日皇爷起,问曰:‘虎丘在哪里?’工部曰:‘在阊门外。’上曰:‘就到虎丘。’祁工部曰:‘皇爷用了饭去。’因而就开场演戏。至日中后,方起马。”^①

从上述的史料中,我们可以看出:康熙帝刚到苏州,便在祁国臣的苏州织造衙署询问“有唱戏的么”,随即亲自点戏,并谕免民间戏班为皇家演出时的清规戒律,一看就多达20余出,直看到夜静更深而毫无倦意。次日一早,他又为看戏而推迟了虎丘之行。如众所知,自满族入关后,清帝南巡首自康熙帝。但是,我们还应看到,康熙帝还是利用南巡之机,饱赏南方昆曲的第一位皇帝。其时,康熙帝此举距清廷定都北京不过40年。自此,康熙更加深刻地比较出了昆曲中南、北两大唱法及其他方面的异同,而南昆的诸多特色则使他明显地看到内廷的太监演员与南方民间艺人的差距!应当说,康熙帝迅速提高对昆曲的兴趣与研究是自此之后开始的。此后,康熙帝还批评了那些不认真学唱昆弋、不刻苦练功的太监演员们,他说:“魏珠传旨,尔等向之所司者,昆、弋丝竹,各有职掌,岂可一日少闲,况食厚赐,家给人足,非常天恩无以可报。昆山腔,当勉声依咏,律和声察,板眼明出,调分南北,宫商不相混乱,丝竹与曲律相合而为一,手足与睛转而成自然,可称梨园之美何如也!又弋阳佳传其来久矣。自唐霓裳失传之后,惟元人百种世所共喜,渐至有明,有院本北调不下数十种,今皆废弃不问,只剩弋阳腔而已。近来,弋阳亦被外边俗曲乱道,所存十中无一二矣。独大内因旧教习,口传心授,故未失真。尔等益加温习,朝夕诵读,细察平上去入,因字而得腔,因腔而得理。”^②显然,宫内太监演员的唱做水平及其有关的管理机构已经越来越不适应康熙帝

^① 姚廷遴:《历年记》(上)。

^② 故宫博物院图书馆掌故部:《掌故丛编》第二辑《圣祖谕旨稿二》,1928年2月。

爱戏的需求和宫内演出的需要，而以上三个例证从不同的角度也深入说明了建立如南府这样的承应内廷演戏、奏乐的机构已是势在必然，剩下的，只是择时建立的问题了。

（五）上文述及的传康熙帝有关昆弋之旨的魏珠理应引起研究者的注意。的确，魏珠在康、雍间非等闲之辈。首先，“御前太监”之称始自魏珠。“从前魏珠、陈福，服勤日久，各有身分，称为御前太监。”^①在跟随皇帝出外各处时，魏珠等人还有一般太监所没有的“跑马射箭”之权。乾隆帝即位后，专此强调当朝太监“断乎不可”！他于乾隆元年十二月初四日在事关魏珠的上谕中指出：“魏珠在世宗皇帝时，身获重罪，因将伊祖母、生母，发回原籍。近将魏珠宽宥，著在寿皇殿当差。曾降旨不许出门。今魏珠竟在王大臣前，妄行递呈，求伊祖母、生母，来京居住。魏珠系不许出门之人，如何擅递呈词，王大臣等从何处接受？魏珠在何处投递，著问明具奏。”经庄亲王和内务府总管查证，系纪文替魏珠递呈。乾隆帝传旨：纪文革职；魏珠由“罚月银二年、重责二十板”，改为单一的罚月银三年。这种只罚不打的处罚，其产生原因显系与魏珠历事康雍乾三朝、年事已高、并曾深得康熙帝的信任有关。可见，魏珠不仅聪明能干，对于昆弋两腔还很在行，不然的话，康熙帝怎能在康熙二十三年后将此篇有关昆弋的精辟论述交与魏珠传旨呢！

到目前为止，我们尚未见到有关魏珠这一人物的研究论著，根据笔者以上汇述，我们可以确认这些珍贵史料是南府建立于康熙朝更为直接的实证。

（六）总之，在经过了康熙二十四年的抗击沙俄入侵、治理河务等一系列治国安邦的大事之后，南府成立了。我们从康熙二十五年《郎中费扬古为宫廷用项开支银两的本》内写的“糊南府所用戏台架子及戏子架子六”，可以看出，康熙二十五年南府已成立，而且是刚刚成立。自此，关于南府的记载在清代档案和官私史著中便史不绝书。这里，笔者仅以康熙朝为主的10点例证加以说明。

1. 康熙三十年，康熙帝有“问南府教习”的上谕，前文已经详析，此不赘述。

2. 康熙三十七年，《尚之杰等为宫廷用项开支银两的本》有：“给南府学艺太监张寿新、李国永牛尾缨藤凉帽二，此一顶以九钱八分计，银一两九钱六分；祖青翠兰布靴两双，此一双以九钱计，银一两八钱。”

3. 同上本，“给南府学艺太监朱子明等三十一人绒缨玉草凉帽三十一……祖青（等）翠兰布靴三十一双。”

4. 康熙四十三年十二月二十六日，《乌尔呼岱等为宫廷用项开支银两的本》内有“准营造司来文，裱糊及制作盛帽盒子、景阳宫房屋、咸安宫房屋、兆祥所房屋、寿皇殿暖阁、南府佛堂、奉先殿朝灯、路灯、满堂红灯及上驷院小折子、斋匣、围屏、表匣等项，用木红纸三十张，此一张以一分五厘计，银四钱五分。”之所以列举此一串名

^① 故宫珍本丛刊：《国朝官史》卷4，《训谕四》，海南出版社，2000年6月。下同。

单,说明南府早已是其中的一个正式机构。

5. 康熙四十七年十月初六日,《恰金泰等为宫廷用项开支银两的本》内有:“初二日,淮南府学艺处治仪正苏博来文学艺处食八两钱粮之教习二、食四两五钱之教习十三、食四两之教习一、食四两五钱之学艺人一、食四两之学艺人一、食三两五钱之学艺人二、食三两之学艺人二十八,此等人本月应给钱粮银一百七十八两内,除商人节省之银一百两外,再多带去银七十八两。”

6. 康熙五十一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全保等为宫廷用项开支银两的本》内写有:“(十月)初三日,淮南府学艺处治仪正苏博等来文,学艺处食八两钱粮之教习一、食四两之五钱之教习十、食四两之教习一;食四两五钱之学艺人一、食四两之学艺人一、食三两五钱之学艺人二、食三两之学艺人二十八,本月应发给之钱粮银一百五十六两五钱内,除商人节省之银一百两外,带去加给之银五十六两五钱。”

7. 成书于乾隆二十六年和嘉庆十一年《国朝宫史》与《续编》内载:南府设七品总管一人,执守侍。八品首领四,侍监。委署首领、太监皆无定员、无品级。乾隆帝又于乾隆五十六年九月强调“南府学艺人等,乃国家岁时宴会,备用音乐所必需”。进而明确了南府机构的职能。

8. 《故宫珍本丛刊》中嘉庆间武英殿写刻本《钦定宫中现行则例》记有:南府总管一名 七品执守侍 每月食银五两、米五斛 公费制钱一贯。另设:首领四名 八品侍监,委属首领、太监均无定额。^①而生活在嘉庆朝的吴振械则明确指出:“康熙间即已有南府之名。”

9. “道光元年奏准,裁减南府景山学生人数,留总管太监一名、首领太监十四名、太监一百九十五名。外学总管二名、首领八名、旗籍学生十七名、民籍学生一百六十六名。承应差务,全数移住南府。”^②

10. 当历史进入19世纪中后期,光绪年间之人徐珂仍明确说:“南府之名,始于康熙时。道光初元,将南府人役一概遣散,光绪朝复之。”^③

以上10个例证再次说明南府建于乾隆朝之说是有误的,应予改正。道光“七年奏准:南府民籍学生一百七十六名,差使无多,赋闲游荡,全数驳出,令回原籍。嗣后差务,责成内学太监承应,不许贻误。又奉旨:……南府著改为升平署”^④。道光七年即1827年,是时距南府建立初始的康熙二十五年(1686)已历141年矣!南府见证了清王朝由盛转衰的全过程。

① 详见该书卷四《太监》。

② 光绪二十五年修:《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1218,《内务府·升平署》。

③ 徐珂:《清稗类钞》第11册《戏剧类·南府》,中华书局,1986年7月。

④ 故宫珍本丛刊《国朝官史》卷4,《训谕四》。

四、南府府址考辨

（一）南府不是吴驸马府

长期以来，一些研究者一直认为南府府址的前身是吴（应熊）驸马府。民国十五年，著名学者罗癭公指出：“南府本为吴驸马府第，后改为升平署，习俗相沿，仍呼南府也。”^① 民国二十一年，齐如山先生提出：因“昆班及昆曲名宿人数……添多，遂迁入南长街吴驸马府，即改名曰南府”^②。著名京胡演奏家徐兰沅则更加细致地说道：“清宫内的南府，由来很久了。据前辈老先生们谈，南府原是吴三桂的儿子吴驸马府，该屋所谓犯五蠹七煞……无人敢住，就作为宫中教戏的所在，故称之为南府。”^③

在有的著述中，将上述吴驸马府就是后来的南府写得绘声绘色，并将吴驸马府写的怪异离奇，这些内容作为戏说可也，但这不是史实。

吴驸马即吴三桂的长子吴应熊，当吴三桂为清初统一驰骋疆场、屡建功勋之时，吴应熊则留在京师，实为人质。顺治帝为了进一步拉拢吴三桂这位平西王，顺治十年八月，钦命将其同父异母之妹、太宗皇太极第14位女儿和硕公主下嫁应熊，次年二月，复授吴应熊三等精奇尼哈番。是时，吴驸马（满族称为额附）和他的夫人同住在今天北京西单北大街东北角（即史书上说的宣武门内石虎胡同）的石虎胡同。后又称小石虎胡同，即现在中友百货北侧东西向的民族大世界服装商城。今胡同不存，其名尚在。吴应熊在世时，一直住在这里。有的学者仅以一个出土的蟋蟀罐为证，说明这里是吴三桂府第。其实，吴三桂与其父吴襄另有住处，这在《国榷》、《明季南略》、《南明史料八种》等史书中都有记载。

根据笔者所见到的史著，最早记录吴驸马府在石虎胡同者是乾隆十九年进士、官至协办大学士、主修《四库全书》的纪昀（纪晓岚），他在乾隆朝后期著有《如是我闻》，写道：“裘文达（笔者按：即乾隆朝名臣裘曰修，《清史稿》等史书有传。）公赐第，在宣武内石虎胡同，文达之前，为右翼宗学（笔者按：即曹雪芹落难京师时的教书处）；宗学之前，为吴额驸府；吴额驸之前，为前明大学士周延儒第。”^④ 上述情况由前而后的顺序就是：周延儒府—吴额驸府—右翼宗学—裘曰修赐第。如众所知，纪晓岚

① 罗癭公著、李宣调校补、樊增祥评阅：《鞠部丛谈校补》，民国十五年涉园刊本。

② 齐如山：《谈升平署外学角色》，见北平国剧学会《戏剧丛刊》第三期，1933年12月。

③ 徐兰沅口述、唐吉整理：《徐兰沅操琴生活》十一《回首当年老梨园》，工人出版社，1959年7月。

④ 纪昀：《如是我闻》[四] 浙江古籍出版社，1997年6月。

以治学严谨名著于世,书中对吴应熊府宅的前后主人记载准确,传承有序,更何况那里又是乾隆帝赐给裘曰修在京的府第!此外,纪、裘二人,同殿称臣,且同为廉洁贤吏、一代名臣,关系融洽,时有过从。一位住在宣武门外虎坊桥附近,另一位则住在宣武门内西单附近的赐第,不远的路程为他们时有过从提供了便利条件。综上考论,纪晓岚记述的吴应熊之驸马府当属毋庸置疑。为此,光绪十一年,朱一新在参加重修《顺天府志》时,将《京师志·坊巷》上下卷再次修订整理,关于石虎胡同条目下的吴额驸府,他特加按语说:“吴三桂子应熊,尚太宗幼女纯恪长公主,即吴额驸也。后三桂叛,应熊及其子世霖皆伏诛。”^①其实,吴应熊死的是冤枉的。康熙朝人刘健专此写道:“三桂……蓄异谋,而应熊则欲终守臣节,保全录位,所以规谏无不至!”及至三桂“反计决,遣李恕、张鏊召应熊,应熊徘徊不果,日饮泣不止”^②。那时,“吴应熊大约年在四十,已是不惑之年。作为公主额驸,他贵为皇亲国戚,爵封少傅兼太子太傅,且与公主相伴,四子承欢。因而,他满足于所得,也感恩于朝廷。”^③黄百家在《耳逆草》一书中和被誉为“记吴三桂最真切之史料”的《平吴录》均有相似与相同之述评。^④康熙十三年三月,康熙帝误听错判,杀害了吴应熊与其长子吴世霖,致使其姑姑、纯恪长公主在凄风苦雨中度过了余生。写到这里,我禁不住想起了“文化大革命”中一句时髦的经典名句:“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想当年,当吴三桂受封平西王、并为大清开国立下了一系列卓著战功之时,他是“英雄”,因此,顺治帝亲自将自己的小妹嫁给了吴应熊,三桂之子贵为皇亲国戚,儿是“好汉”。康熙十二年,吴三桂举起反清大旗,振臂一呼,应者云集,严重威胁了清初政权。吴三桂顿时成为了“反动”头子,应熊也因此列入“混蛋”之列,无端惨遭杀害,且株连了吴氏老少亲眷!这是康熙帝在平定三藩之乱时亲手制造的又一起冤假错案!^⑤所以,所谓吴应熊参与三藩之乱、策划北京杨起隆起事,都当另作商榷,因为,那恐怕是康熙帝为了清初政权而杀人的借口!由此考论出吴驸马府的地址及其他与南府的关系是有着不同寻常的意义的。可见,清代戏剧文化与清代政治史的关系是多么密切!

(二) 南府与南花园

南府府址的前身,在明代叫“灰池”,在清初则叫南花园。康熙二十五年以后,这

① 朱一新:《京师坊巷志稿》卷上,北京古籍出版社,1982年1月。

② 刘健:《庭闻录》卷6。

③ 刘凤云:《吴三桂传》第207页,兰州大学出版社,1999年3月。

④ 请参见谢国桢先生:《增订晚明史籍考》第695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2月。拙著:《清史述得》第95页,辽宁民族出版社,2004年6月。

⑤ 有关这方面的其他内容,请参阅拙文《康熙帝用人刍议》,原载《光明日报》1987年9月30日。

一负责内廷演戏和奏乐的新的机构遂名之曰南府。所以，乾隆初时有“南花园今改名南府”^①之说。

康熙前期，亲历其地的名士名臣高士奇记述道：“南花园在西苑迤南，东向，明时曰‘灰池’。种植瓜蔬于炕洞内，烘养新菜，以备春盘荐生之用。立春日进鲜萝卜，名曰‘咬春’。本朝改为南花园，杂植花树，凡江宁、苏、松、杭州织造所进盆景，皆付浇灌培植。又于暖室哄出芍药、牡丹诸花，每岁元夕赐宴之时，安放乾清宫，陈列宴前，以为胜于剪彩。秋时收养蟋蟀，至灯夜则置之鳌山灯海内，奏乐既罢，忽闻蛩声自鳌山中出。每岁正月，进梅花、山茶、探春、贴梗海棠、水仙花；二月进瑞香……十二月进早梅、探春、迎春、蜡瓣梅……安放懋勤殿。余曾有诗纪之……菊花以绿竹作架，各悬小牌，书某种，如粉西施、水晶盘、太史黄、紫罗兰之类，按时舁送各宫殿安放，花残则随时易以新者。南书房亦如之。”^② 附带强调一句：本书作者在为其作序的时间是康熙二十三年六月，书内只字未提南府，是为其时尚无南府之又一例证。

关于南花园“改名”南府，那南花园为皇家培植花虫鲜菜的事就荒了吗？《燕都丛考》在清末民初时还为南花园的功能总结为四方面，即：烘养新菜；“咬春”；秋天养蟋蟀；按时将养好的“杂花奇树”送往各宫殿。至于明朝时，此池何以叫“灰池”也通过引证《春明梦余录》、《芜史》等作了说明。^③

显然，南府、南花园，它们是为皇家服务的两种功能性质截然不同的机构，南府更不可能将其全部占用。众所周知，南花园离皇宫近在咫尺，如果真是将其全部挪用拆迁，那皇上要是犯了嘴馋到哪儿去尝鲜和观赏那奇花异草呢？对此，笔者一直心存疑惑。果然，光绪初年的《京师坊巷志稿》中，南花园与南府成为比肩相邻的并列的两个地名。在这里，作者对南花园作了详细介绍，而对南府，则没有一字介绍。南府之后的地名是东沟沿、北花园、大烟洞胡同（后改为大宴乐胡同）。^④ 到了清末民初，“南长街南口之东，曰南花园，今已尽为民居。中山公园辟门于是，未开行”。至于南府，已无其名的相关记载。其后，“南长街之西，南曰猪肉下坡，今改为西大街，又西曰升平署，今为华北大学。稍北曰后铁门，再北曰大烟筒胡同，今改为大宴乐胡同。”^⑤ 民国中，王芷章先生明确指出：南府时期各伶“在城住南府附近及景山之内”。^⑥ 可见，从南府到升平署，它们所在地的大方位没有改变，但内里

① 吴长元：《宸垣识略》卷16，《识余》。

② 高士奇：《金鳌退食笔记》卷下，《南花园》。

③ 陈宗蕃编著：《燕都丛考》第七章“内六区各街市”，北京出版社，1991年10月。

④ 朱一新：《京师坊巷志稿》卷上，《南花园 南府》。

⑤ 陈宗蕃编著：《燕都丛考》第七章“内六区各街市”，北京出版社，1991年10月。

⑥ 王芷章：《清代伶官传·例言》。